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〇七期 ——
(二〇一三年八月十九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1308c)

【前车之鉴】	文革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徐友渔
【痛定思痛】	“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文革之痛	谌旭彬
【亡灵祭坛】	一层终于捅破了的窗户纸——纪念红八月受难者 卞仲耘老师和证人林莽 (陈洪涛) 老师	王容芬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八)	孙怒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前车之鉴】

文革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

• 徐友渔 •

文化大革命是将近半个世纪之前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一场令世界震惊的运动，说它对今天的中国还有影响，似乎有点耸人听闻。但薄熙来事件和所谓“重庆模式”的起落表明，文化大革命像幽灵一样，至今仍然纠缠住大陆中国。2012年3月14日，在“两会”结束之后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中国总理温家宝把薄熙来在重庆的做法和文革相联系，并提醒中国人民，不能让文革的悲剧在中国重演。温家宝的讲话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中国的民众，中国的知识分子明显表现为两个阵营，一个挺薄，歌颂重庆的“唱红打黑”，怀念并呼唤文化大革命，另一个阵营的立场则截然相反。这说明，虽然文革被官方宣布为永不重现的浩劫，被许多人视为远远离去的噩梦，但实际上在当代中国的政治中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仍在起作用的因素。

不论是坚决挺薄的人，还是坚决反薄的人，都把他在重庆的所作所为当成是文革的重演，这一点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文革以史无前例，令全世界目瞪口呆著称，以失败告终，被官方彻底否定，怎么会重演呢？所以，我们首先要讨论的问题，是文革是否真正在重庆重演，在什么意义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文革在重庆重演。

一般而言，历史不会一成不变地重演，特别是像文化大革命这样脱离人类社会生活常轨的事件，更不会照原样重演，何况人们都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和上世纪60、70年代有很大的不同。最重要的一点是，像毛泽东那样在中国掌握绝对政治权力，没有人可以反对，没有人敢于挑战，喜好发动群众性政治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了，而且再也不会产生。同样重要的是，与当年中国奉行的坚决反对市场经济，名为“自力更生”实则闭关锁国的方针不同，今日中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具有相当规模，而且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那么，人们把“重庆模式”比作文革，是不是错了呢？

我认为没有错，没有人认为薄熙来下台前的重庆搞的和文革一模一样。但是，就其一些重要特征而言，相比于中国应该走的宪政民主和法治的道路而言，重庆模式确实很像文革。让我来做对比和分析。

引起全中国各界人士关注的，重庆方面自己宣传的重庆特色是所谓的“唱红打黑”，这两个很带中国特色的元素需要解释。“唱红”，即是大规模地，持续地唱过去年代革命歌曲的运动，既然是运动，就不仅是个人喜欢唱就唱，不喜欢唱就不唱，而是有组织地唱，电视台、电台整天播放，经常组织大型演唱会和比赛，据说有的演唱会参加人数高达10多万，整个唱红歌运动卷入的人数高达千万。这已经不是人们对于某类歌曲的个人喜爱的问题，而是政府使用公共权力强行发起和推动某种观念的问题。这些歌曲的主题和内容主要是歌颂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尤其是领袖毛泽东，意识形态色彩强烈。比如“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有的鼓吹个人迷信，比如把毛泽东说成是太阳，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不断有人指出，连国际歌都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最反感的一首红歌，说中国共产党比自己的母亲好，因为母亲不敢反抗压迫者，只能哭泣和屈服，而共产党好就好在号召人们起来革命。说实在的，我已经非常习惯中国共产党漫无节制地自我歌颂，但要求人们贬低母亲来衬托党的伟大，这实在是太过分了。

重庆的唱红歌运动，不但党和政府机关唱，学校唱，工厂农村唱，连监狱和疯人院也唱，甚至强迫基督教、佛教、道教等宗教界人士唱。有一张照片，拍的是监狱里穿囚服，剃光头的犯人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而照片的说明很搞笑：是哪个王八蛋，把共产主义接班人关进监狱！

我认为，重庆的“唱红”运动，和文革中大唱革命歌曲，宣称“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一切阵地”，搞“红海洋”完全是一样的。所谓“红海洋”，就是要做到，在人们目力所及的一切地方，都是革命的颜色即红色。天空中飘动的是红旗，所有的建筑物上都涂上红漆，写上毛泽东的语录和革命标语。不论是在重庆还是文革中的中国，表现的都是意识形态狂热。

“打黑”，即是公安机关大规模地、强有力地打击黑社会组织。没有人认为打击黑社会不对，其实，薄熙来的前任也打黑，中国其他地方也打黑，为什么重庆的打黑能独树一帜？重庆在薄熙来任上打黑有鲜明的特点，这些特点和“唱红”结合在一起构成“重庆模式”。

重庆打黑的特点是规模大、速度快、判罚尺度严，这些特点到了超出常理的地步，是以严重破坏法治为条件进行的。

在打黑运动中，重庆在2010年成立了300多个专案组。我们知道，专案组盛行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所谓专案组，就是以案件为中心，公安、检查、司法机关的人员一起办公，三者之间完全没有监督和制衡。在这种情况下，抓捕是大规模的，往往是任意的，很多情况下是先把人抓起来再想办法取证，这一个罪名不成立就换一个罪名。把人抓起来不是关押在符合司法规定的地方，而是秘密地点，这样，嫌疑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没有司

法监督，刑讯逼供是普遍的。

我们知道，文革中最遭人恨的事物之一就是专案组，因为它无法无天、践踏法治、胡作非为、草菅人命，文革结束之后，中国最高当局曾正式宣布过，要永远废除专案组的作法，而在薄熙来治下的重庆，专案组居然又恢复了。

有一位在重庆替打黑对象做过辩护的律师告诉我，在重庆，刑讯逼供已经普遍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如果警察认为不需要对某人刑讯逼供，他们需要作为特殊案例向上级报告。他的委托人曾在法庭上指证出庭的某个检查机关的人拷打过他，并出示伤痕，这个被指控的人双手掩面，低垂着头一声不吭。最后，庭长宣告，由于被指控者没有承认，刑讯逼供的说法不成立。

重庆打黑运动的一个伴生现象是对所谓黑社会人员的财产没收，其实打黑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以司法手段进行经济掠夺。重庆最富裕的民营企业家中前三号人物都被说成是黑社会重要成员被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其他中小民营企业家被抓捕判刑或逃离到海外的人也很多。依靠这样的方法，重庆当局劫掠了数千亿人民币，其中一部分作为国家财政收入，以证明重庆的经济发展成绩，用于收买人心的“民生工程”或“富民工程”，即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

李庄案是重庆打黑运动嘲弄法律的典型案例。李庄是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代理重庆一个打黑案件，被告是一位企业家。重庆的公安机关指控李庄唆使被告作伪证，当法庭对质问到李庄是如何唆使时，那名被告提供的证言竟是：他用眨眼睛的方式向我传递信息。李庄被判入狱，在刑满前夕，重庆警方还想继续关押他，以与重庆毫无关联的罪名另行提出指控。这种无视法律的作法激起了中国法学界和广大律师的愤怒和抗议，在全国性的强大抗议声浪中，中共最高领导人为了“稳定大局”，出面干预，对李庄的审判在开庭前夕被匆忙宣布取消。人们可以从李庄案中清楚看到，法律纯粹成了儿戏。所以，中国人给重庆的“打黑运动”取了个正确的名字，叫做“黑打”，即用非法的方式、类似黑社会的方式办案。

文化大革命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践踏法治。当国家主席刘少奇被红卫兵从家中带出去批判斗争时，他举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自己还是共和国主席，人身自由受宪法保护，这个举动赢来的只是一片嘲笑。刘少奇主席没有经过任何审判程序，被带到外地秘密关押，在虐待中痛苦地死去。

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是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性现象，在文革中，毛泽东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被视为绝对真理，用毛泽东的副手林彪元帅的话来说就是：“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由于文革的教训，人们对于个人迷信十分警惕和反感，文革结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对政治领导人的歌颂是有一定节制的，而在前不久的重庆，薄熙来却成了人们歌颂的对象，重庆流传着“薄熙来之歌”，市内悬挂着大标语“薄书记辛苦了”。

现在我们转到这个核心问题：既然文革曾经遭到中国官方和民间的一致批评与谴责，那么在今天的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和支持薄熙来？不用说，支持他的人并不是喜欢他个人，而是喜欢他的重庆模式，是喜欢这个模式中与文化大革命相同的地方。因此，问题也可以这么表述：文革曾经给中国造成巨大的损害，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怀念和向往文革？

其实，人们的立场和感情是有变化的。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没有什么人敢于公开表示支持文革，那时候人们对于文革的苦难记忆犹新，对于文革这场噩梦还心有余悸，而当时中国似乎正在走一条与文革的方向正相反的道路，这是建立民主和法制，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中国领导人开始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燃起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希望和信心。

但是，即使在最有希望的80年代，中共最高领导也没有彻底批判文革，没有认真批判对于文革负有责任的毛泽东。那些重新上台的干部，虽然在文革中吃了苦头并对毛泽东有怨言，但并没有打算改弦更张，他们认为，毛泽东是维持他们统治的旗帜，他们不打算抛弃这面旗帜。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时，毛泽东说过，斯大林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共产党不能扔掉这把刀子。文革后的当权者同样把毛泽东当成实行专政的刀子。在他们所作出的关于当代中国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他们仍然赞扬毛泽东的功绩。同时，当权者不允许人们谈论文革，因为文革是执政党干的一件错事、丑事，文革暴露了中国社会和政治的大量阴暗面。时至今日，文革是研究和出版的禁区，甚至连翻译出版国外研究文革的学术著作都很难做到。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进入了复杂、艰难、痛苦的社会转型时期。曾经反对过改革，以为改革会动摇自己地位的官僚们突然发现，其实改革对他们很有利，给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以权力换取金钱的机会，于是他们支持改革，把改革纳入自我利益的轨道。改革变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但这已经不再是人民可以寄托希望的改革，而是少数特权阶层的改革。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正越来越瞩目惊心，社会冲突越来越加剧和频繁。90年代的局面与80年代大为不同，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什么样的改革”，谁为改革的成本付出代价，谁从改革中得益。

自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就没有参与政治的机会，他们唯一参与政治的亲身经验就是文化大革命。根据这样的经验，人们认为既然现行的反对贪污腐败和实现社会公平的方法没有用，那唯一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绝望的人们的心目中，文革的苦难消失了，镇压不存在了，毛泽东时代变成了平等的时代，追求理想的时代，人们道德高尚、大公无私，官员廉洁奉公。在下岗工人和弱势群体的抗议集会和游行中，出现了毛泽东的画像和文革的口号。毛泽东在文革中把官员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打倒显得没有多少说服力，因为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经济政策方面没有什么资本主义的因素，而在大力推行市场经济的今天，一般民众要把官员们看成是“走资派”，则显得有道理。

其实，文化大革命并不像官方描绘的那样，是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的错误施展阴谋；也不像一些简单地理解和反对文革的人以为的那样，单纯是人们上当受骗。我们必须正视一个令人尴尬和难于理解的事实：文革是得到亿万中国人拥护的，他们真心诚意地，甚至狂热地参加到这场政治运动中。要理解当前为什么许多中国人呼唤文革，就需要理解当初是什么力量驱使中国人参加文革。

文革的特殊之处在于，毛泽东想要打倒自己的政治敌人，他没有用惯常的共产党内权力斗争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很可能，通常的方式不能使他达到目的，他使用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的方法，他利用群众，开展群众运动，把群众争取到自己一边。

毛泽东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答案是，他理解当时中国的社会弊病和社会矛盾，他打起了公正和平等的旗号，让人民以为他是社会正义的代表，是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的，是带领群众与官僚特权做斗争的。

古今中外，统治者中并不缺少这样的人物，他们自己是某种坏制度的缔造者或维护者，但他们深深了解这种制度的问题，知道这个制度并不公平，他们在某些关键时刻会批评这个制度，许诺要改变这个制度，以此来争取民心，达到打倒对手或取得更高地位的目的。他们不是一般的政治家，而是机会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是政治野心家。毛泽东是这样的人，薄熙来也是这样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由于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惨遭失败，毛泽东被迫把行政管理的

大权交给刘少奇，毛感到自己日益失去权力，决心打倒刘，他以猛烈批评现存制度的方式攻击刘，大谈现存制度的弊病，甚至说出这样尖锐的话：官僚特权分子已经成为喝劳动人民血的阶级。在文革初期，毛一开始故意把领导权交给刘少奇，紧接着说刘少奇执行的是压制群众、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而自己的政策是支持群众、解放群众的革命路线。他替许多被刘少奇及其下属打成“反革命”或“右派”的人恢复权利和名誉，人们拥护毛，不仅出于意识形态，不仅因为毛是最高领袖，而且是他们认为，只有毛才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毛与其对手的区别是公平与不公平、平等与不平等的区别。

薄熙来在重庆的作法实际上是在模仿毛。他自己以前在大连工作时搞的一套就是以权谋私，利用和支持黑社会，但他到重庆之后把所有的问题都归咎于他的前任，他自己在制造极大的不公正，却打出公正、平等的旗号，他的所谓“富民”工程和“亲民”口号使他成为一颗迅速上升的政治新星。

毛的文革失败了，因为他在某种意义上是要与大多数官僚特权分子为敌，用自己的亲属和亲信取代他们；薄熙来也失败了，原因差不多，他破坏了当今利益集团的规矩，破坏了共产党的规矩，他想一人出人头地，他忽视统治集团其他人的利益，他藐视这些人，经常不掩饰地说出自己的看法。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可悲之处在于，他们完全无法看清楚毛泽东和薄熙来的本性，他们以为政治领袖中少有的好人失败了，他们不知道，在一种坏制度之下，政治家只有表演方式的不同，争权夺利方式的不同，而没有正义与不正义的区别，爱护人民与欺压人民的区别。

以上说的，都是文革与统治阶级成员的关系，都是文革的负面因素，即统治者如何利用公平和平等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利用群众、动员群众。但文革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还有正面因素。我的观点是，在文革之前，中国有零星的个人争取民主的行动，但绝对没有民主运动，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后果是，与其发动者的初衷相反，文革，或者更准确地说文革的失败，导致了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产生和发展，作为这一过程的观察者和参与者，我有许多话要说。

文革的后果之一是使人们有了独立意识。北京一位被我采访过的前文革积极分子说：“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全国八亿人就只有一颗脑袋，也就是说，只有毛泽东一个人能够思维，其他的人只有服从。其结果是，毛泽东想对了，则全国的事都对，毛泽东想错了，则全国的事都错。文革后，每个人都发现原来自己肩上也长了一个脑袋，也可以自己动脑筋想问题，不能够以别人的思维代替自己的思维。”

从总体上说，参加过文革的那些年轻学生已经抛弃了文革前和文革中那种虚幻的理想主义和盲目的英雄主义，以及狂热的个人崇拜。他们再也不会把领袖的意志当成绝对命令，再也不相信有“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他们或者以憎恶的心情，或者以苦涩的心情对待过去的革命信念，在因为这种东西欺骗、愚弄过自己，或者是使自己吃尽苦头。这一代人对官方的意识形态宣传持疏离、警惕、嘲弄态度，尤其对以阶级斗争为名义进行的政治运动持否定态度，在80年代，中国搞了几次政治运动，如“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但这种政治号令在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或中年中完全得不到响应，他们之中各人观点并不一致，但对于再搞类似于文革的清洗运动或大批判运动都抱讨厌和抵制态度。他们在平时可能言行各异，但都不愿意在文革中那样在政治运动中充当积极分子。

经过文革，人们大大增强了抵抗压制或镇压的能力，人们发现了当权者对群众实施专制的秘密：他们虽然掌握了镇压群众的暴力，但不是一遇到情况就立即使用暴力，而是让人永远感觉自己头上悬着达摩克利斯剑。人们之所以服从，在少数情况下是因为暴力镇压已经实现，而在

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暴力镇压的可能和威胁始终存在。但许多人在文革中人们对于被批判斗争甚至被抓捕都见识过了，一般的威胁就不是那么起作用。

举一个我熟悉的例子。1989年春季，几批知识分子签名发表公开信，要求释放魏京生等政治犯，当局马上作出反应，或上门打招呼，或找人谈话加以警告，并通过宣传工具说这一事件有“海外民主运动”的背景，言下之意是说有反动势力在背后操纵。这样一种手法在以前非常奏效，这一次在年长者中也起作用，签名者中，个别老知识分子在哄压下表示了悔意，说自己是不了解情况而签了名。但这种手法对多数中青年不起作用，其中一位说：“这一套我们在文革中见得太多了。中共的思维和行为逻辑就是这样：一遇到不同意见，不管事情本身的原因，马上断定有一个阴谋，有人策划和操纵，于是集中力量打击领头的人，把一般人当成上当受骗者，要他们揭发和检举。”当大多数人不再追随镇压者摇旗呐喊，当被打击的人中受孤立者不再恐慌，一般人不再相信背叛会有好处时，文革前和文革初期的那种镇压方式就失效了。

文革结束之后不久，从进入80年代开始，以青年学生为先主体的民主运动开始涌现并不断发展壮大。这种运动明确提出了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口号，希望逐步改变现存的一党专政制度。这和1957年由于毛泽东的号召而产生的大鸣大放不同，也与文革中因为毛泽东的鼓动而掀起的造反运动不同，这是群众自发的运动，是以世界公认的价值准则为诉求，而不是受党内派系斗争左右或影响的运动。事实上，我们可以把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看成这种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开端，它虽然表现为群众怀念和支持党内的温和派，刚去世的周恩来，反抗文革派，但它的基本精神是反对专制和独裁。天安门广场上最引起人们注意的口号是“秦始皇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口号标志了中国人民的觉醒，标志着中国真正的民主运动的开端。就此而言，文革的结束是和民主运动的兴起同时发生的。

文革和民主运动的联系是不难被人注意到的。弗兰茨·迈克尔（Franz Michael）早在1967年就预言：“毛攻击党组织可能要为爆发巨大的群众性不满打开口子，而随着偶像的跌落，这可能变成反对共产主义本身。”约瑟夫（W. A. Joseph）则说：“政治变革的一些最紧急和有说服力的要求出自以前的红卫兵，特别是出自那些有幸完成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现在在运动的前线为中国民主事业作先锋，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们和同代中的许多人一样具有政治上的怀疑精神，但他们是积极投入而不是漠不关心。”这两位中国问题专家的说法是对的，群众由毛挑动起来攻击毛在党内的政敌，但后来发展为攻击党本身，一些文革运动的先锋红卫兵和造反派在运动后期投入了民主运动。

但我们需要更详尽的分析，因为人们自然会问，从宪法和法治的观点看，文革是反民主的，这一场党内血腥的斗争怎么能孕育出民主运动呢？难道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倡的所谓“大民主”导致了真正的民主？不是，当以前的造反者变为后来的民主追求者时，他们的理想和造反精神保留着，但他们追求的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很多东西与以前正相反。

当约瑟夫指出以前的红卫兵现在是民主运动的先锋时，他紧接着说：“他们再次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作出深刻评论，但现在他们要求的是像分权、监督、制衡、竞选、法制、出版自由这样的东西——他们一度视为不过是资本主义圈套的那些原则和程序”。

文革中“民主”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这固然是出于毛想要打倒政敌的需要，民主成了他争取群众的手段。但事情还另有一面，人们一方面在行动上实践毛给民主规定的内容（打倒“走资派”），同时又在理念上肯定了民主的普遍价值。当毛从魔瓶中释放出“民主”这个妖怪，以为它会永远当自己的忠实奴仆时，他实际上控制不住它，不能将它再收回瓶中。长期以来，在共产体制和传统专制文化双重箝制下，民主的要求除了存在于少数先进知识分子心中之外，很难得到公开的表达，而文革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如前面所说，文革的后果是大大打击了党的权

威，增强了人们的独立意识，这无疑增加了人们追求民主的精神力量。

要把民主的愿望变成争取民主的行动，最大的障碍是人们的恐惧心理，而文革大大减轻了人们的恐惧，这一点对青年学生尤其适用。他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亲眼见到人民动员和团结起来之后的巨大力量，他们看清了掌权者并不是威力无边的，他们的力量建立在群众的孤独隔绝状态之上。文革中斗争的反复和曲折还使他们知道，一时的失败和挫折并不意味着彻底完蛋，当权者现在把你打成反革命，可能过不了多久你就会得到平反，可能他自己就会因此垮台。以前人们一旦被戴上政治帽子（比如被说成是“右派”或者“反革命”）就抬不起头，见不得人，经过文革，人们不再惧怕这一套了。文革前，如果你被警察叫去问话，你会心情沉重，愁眉苦脸，你的邻居或同事会把你当成一个传染病人，避免与你接触。文革之后，人们不再会以胆小如鼠的态度对待警察的传讯，对待他们的监视、窃听电话、查阅邮件，等等。

文革还刺激了人们，尤其是青年学生对政治的兴趣。一位被采访者说：“文革前政治是禁区，后来发现政治是人人可以玩的。我们发现自己也在文革中干得挺不错。当然，文革不是真正的社会变革，我们不过是在笼子里跳舞，但跳上了瘾，就想在外面去跳。”文革使一大批人受到锻炼，使他们掌握了政治斗争和抵抗镇压的技巧。

文革中大字报大多是用来揭发批判“走资派”的，但人们由此看到言论和舆论的巨大力量，知道言论自由是无权者争取自身权利的重要武器。文革使人们能熟练地运用这个武器，在文革后的每一次民主运动中，它都是民运人士和大学生主要使用的武器。文革中的大字报并不等同于言论自由，但它使人们明白了言论自由的价值和力量。中国民运的著名领袖胡平就一直强调，言论自由是中国民主运动的基石。在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信息和言论传递的作用表现得更是突出，最近这许多年在中国大陆发生了无数次公民的维权活动，每一次把人们发动、组织和团结起来的工具都是电子邮件、微博和手机短信。

1989年，中国青年学生争取民主的和平抗议运动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事件，在这个事件中，也有文革的幽灵出现。1989年之后流亡海外的著名作家郑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他积极地参与了1989年事件，他曾在斗争的关键时刻建议学生采取绝食抗议的方法，而这一方法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观察造反派的斗争学到的，他对绝食斗争产生的悲壮气氛和震撼力印象深刻，以至于在20多年之后都记忆犹新，并向学生推荐。我们知道，绝食抗议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不管人们对这个行动的评价如何。

另一方面，文革对于当时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邓小平来说，也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美国研究文革的著名学者麦克法夸尔指出，邓小平在1989年事件中的思维逻辑和行为逻辑与他的文革亲身经验密切相关，他把学生的抗议看成是当年造反派对当政者发起冲击的重演，他下令镇压学生，出于他恐惧和憎恨造反派的心情。麦克法夸尔的观察和评论是正确的，尽管邓小平把1989年学生民主运动看成是文革中造反派活动的重演是他的误判和偏见，但他确实是在这种心理的支配下决心镇压的。据官方媒体报道，6月4日镇压之后，邓小平在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军官的会议上说，参加89年民主运动的人当中，有当年的文革造反派。

在我看来，今日中国的现实，与文革最为相关的是，太子党在党、政、军和经济领域中占据重要地位，说明了文革初期流行的血统论的全面胜利。文革刚开始，高级干部的子女就提出以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为代表思想的血统论，他们宣扬“权权权，命相连”，叫嚷“高级干部子女就是要掌权”，要把不承认他们先天优越地位的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他们论证说，中国几千年的作法是“父业子承”，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情况将仍然如此。

在血统论最为嚣张的时候，青年工人遇罗克勇敢地站出来批驳这种谬论，他的观点得到来自全国各地年轻人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在全国很多地方，人们打着手电筒，连夜朗读和抄写他的文章，他每天收到表示支持的读者来信多达几大麻袋，由此可见血统论在中国的危害之深，人们深受其害反对之心有多么迫切。遇罗克作为思想犯被逮捕并被枪决，一些支持他的观点的年轻人也被枪决。文革结束后，遇罗克被迫认为烈士和英雄，血统论恶名昭著，遭到严厉谴责。

但是，最近若干年的事态发展说明，反血统论的胜利只是道义上、舆论上的。而血统论则取得了实质性的、体制上的胜利。查一查今日中国行政官员中副部长、副省长或者以上的干部，军队中将军，国有大企业中老总副老总等领导人的家庭背景就可以明白，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已经被太子们瓜分了，垄断了。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广泛流传着“红二代”（革命领导人的后代）和“官二代”（现任党政官员的后代）的说法，这表明，中国的权力是由一些家族控制的，政治、经济的利益是通过血缘关系来传递的。

这种现状，与一个法治的、现代的、文明的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是背道而驰的。这说明，中国人在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也说明，彻底地批判文化大革命，是中国走上宪政民主道路必须补的一课。

□ 原载《冷眼》

~~~~~

#### 【痛定思痛】

“大义灭亲”式告密不仅仅是文革之痛

• 谌旭彬 •

近日，一则名为《一名红卫兵的忏悔：永不饶恕自己“弑母”》的新闻刺痛了诸多人心。（见“方忠谋被儿子出卖而死”，载于本刊 z k 1 3 0 3 c ——编注）但当隐隐作疼的人心再次不约而同地集体指向“文革”时，反思本身已不完整。

◇ 这类告密已不同于传统告密模式

《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呈现给世人的是一种丑陋的告密之恶。这类告密，已突破了传统告密模式“亲亲相隐”的底线，有完全不同的发生逻辑。

因当权者的需要和鼓励，中国告密传统源远流长。远者，如公元前 114 年，汉武帝出台“告缇令”，即是鼓励百姓举报一切相识者的资产。武帝为从民间捞钱，此前曾颁布过“算缇令”，对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征收“财产税”，但百姓有抵抗情绪，政府又缺乏统计手段，实施效果很差。武帝遂想出鼓励百姓互相举报资产这般损招。“告缇令”规定：凡被人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其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被奖励给告密人。此令一出，民间告密之风大盛，司马迁总结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时说：民间“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各郡国“得民财物以亿计”，“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终于发展到中产之家全部破产，百姓花光吃光不思储蓄的境地。

近者，如台湾 50 年代到 80 年代的“白色恐怖”。学人王鼎钧觉得自己身边当年遍布告密者：“那时偌大的办公室只有一具电话，我接电话的时候，总有工友在旁逗留不去，他们让我看见‘竖起耳朵来听’是个什么样子。他们好像无所用心，低着头擦不必再擦的桌子，但眼珠滚



动,耳轮的肌肉形状异乎寻常。如我会客,总有一个工友殷勤送茶换茶,垂着眼皮,竖着耳朵。……那时,工友是他们得力的耳目,管理工友的人必定是‘组织’的一员。”那时候,台湾在蒋经国的主持下,有10万余名警察及5万余名各类特工,更不知发展了多少“工友”做眼线,台湾民众无一不在监视之中,无一不在被告密的恐惧之中。

无论古今,这些传统告密模式,或是群众运动,或是当局撒网,虽然残酷,但“亲亲相隐”总是最后的一道底线。即便是尊奉商鞅之学的秦国,《商君书》里虽有规定“民人不能相为隐”,否则必受株连,但云梦秦简里仍有“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的规定。张家山汉简里的规定更严厉:“子告父母,……勿听而弃告者市”。

但在文革中,“大义灭亲”事迹——子女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哥哥检举弟弟者层出不穷,红卫兵告密“弑母”这类案例,亦非鲜见,“亲亲相隐”的底线已全线崩溃。何以会如此?阶级斗争新思维是个中关键。如1943年延安整风期间,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人性·党性·个性》一文,认为“任何种人性并不是先天带来的东西,而是某一种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所以,在阶级社会中,人性的问题就是阶级性的问题”;再如1957年,针对社会上“不近人情”、“六亲不认”的批评,《学习》杂志刊文指出:“‘人情’是阶级意识形态的表现,‘六亲’也各有自己的阶级地位,都是有阶级性的。问题在于‘近’什么人的‘情’,‘认’什么人的‘亲’。其中有一个显明的界限,这就是阶级立场。”文章公开支持以“阶级立场”为标准“大义灭亲”:

“当一个良好的公民或革命的干部检举自己亲属中的反革命分子,或是提出与自己的反动阶级家庭从政治上、思想上划清界限时,右派分子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六亲不认’。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一个好公民、好干部为了社会主义事业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否则,就要成为反革命分子或反动阶级的俘虏。”

1958年第22期的《中国青年》杂志还刊登有姚文元的一篇对巴金小说《家》的批评文章,在文章中,姚毫不留情地批评巴金的小说“把血缘的感情放在阶级感情之上”,削弱了“青年‘大义灭亲’的斗争性”。文章说:

“(小说中的)高老太爷是这个黑暗王国的国王,所谓‘一家之主’。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人物,残酷毒辣,死硬地维护封建道德,杀人不见血。……到他临死的时候,作者不是用充满仇恨的笔调去引导读者无情地憎恨这条毒蛇的死亡,却用十分哀痛的笔调叫觉慧、觉民去扮演‘和解者’的角色,叫那个被有些人目为‘英雄’的觉慧‘把身子靠在祖父的膝前’,‘用悲惨的声音叫着爷爷’,好象过去做了多少对不起祖父的事,现在在这最后的一刹那加以挽回,要请他‘原谅’。这不是向地主阶级妥协,为地主阶级减轻罪恶,把血缘的感情放在阶级感情之上,又是什么呢?而那位高老太爷竟也的确‘原谅’了他们,小说中把他的临死的痛苦衰弱的形象写得那样令人同情:‘他的嘴唇又动了,瘦脸上的筋肉弛缓地动着,他好象要做一个笑容,可是两滴眼泪开始落下来。他伸手在觉慧头上摩了一下,又把手拿开,然后低声说:‘……你回来了……冯家的亲事不提了……你们要好好读书……唉!’一声长叹,表现了高老太爷内心的忏悔,他在为觉民的婚事而难过。读者看到这里,不是会对他引起一种默然的同情和怜惜,觉得他‘也是为了子孙好’吗?而这种和地主阶级妥协的感情,会严重地削弱青年‘大义灭亲’的斗争性。”(《论巴金小说〈家〉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和它的消极作用——并谈怎样认识觉慧这个人物》)

◇ 这类告密也不仅仅是“文革”之恶

文革期间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既以“阶级情感”为准绳,自不可能仅仅发生在文革期

间。“文革”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发生的“大义灭亲”式告密的数量，绝不会比“文革”期间更少。所以，若仅仅局限在文革范畴内反思“大义灭亲”式告密，仅仅将其视作“文革之恶”，这样的反思就难免有失偏颇。

事实上，对“大义灭亲”式告密的鼓励和宣传，早在文革之前即已开始。以1952年“三反运动”中的《人民日报》为例，1月24日报道了《北京市第五中学青年团员王世桓检举他父亲贪污行为》；2月4日报道了《北京大学学生展开坦白检举运动，不少学生检举了自己亲属的违法行为》；2月6日，报道了《许东才站稳人民立场检举奸商父亲》；3月8日，又报道了《门头沟机电厂职工家属大胆检举和规劝丈夫坦白》……

从这些报道里，不难看出当时的宣传，竭力有意突出“阶级情感”与“血缘情感”之间的斗争。譬如：“在运动开始时，（北京大学的）很多同学对检举贪污是有顾虑的。但随着运动的展开，同学们对这一次运动的认识渐渐提高，顾虑也逐渐打消。中文系二年级同学胡祥达在运动开始时，想起他的家里有两本账簿，其中一本是专门对付收税人员的假账。他想动员他的父亲坦白，但是怕他的父亲说他‘忘恩负义’，因此他把这事放在心里没有说。后来他记起‘中国青年’杂志上批评郑辉人包庇地主家庭一事时，立刻恍然大悟，就一方面向天津工商业联合会节约检查委员会检举他的父亲，另一方面动员他的父亲坦白。到一月二十日止，北京大学检举的案件达一百九十三件，其中百分之四十是检举自己家属的。”“王世桓看出他父亲心中有病，就对他解说人民政府的政策，希望他赶快坦白。但他依旧不肯低头认罪。王世桓最后对他说：‘你不坦白，我要向学校方面检举你。’他父亲听了非常气愤地说：‘我把你养大，你却要检举我，你还有良心吗？我要是特务，你也要检举？’王世桓坚决地回答他：‘你要是特务，我更要检举你！’”

“文革”期间的“大义灭亲”式告密的特殊之处在于：在此之前，“大义灭亲”式告密的主体，以“右派、‘地主’”等“阶级敌人家庭”为主；1965年毛泽东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1966年“文革”爆发后，干部家庭子女遂大规模加入到“大义灭亲”式告密的队伍中来。如陈丕显之子陈小津回忆：

“我被‘专政’了，他们还不放过那些比我小许多，正在上中学的小阿弟、小阿妹们。1968年2月，王少庸两次给时任徐汇区‘革委会’主任的黄克布置任务，要他把家住在徐汇区的华东局、市委负责干部的子女‘管一管’。于是，5月9日至6月中旬，由‘徐汇区红卫兵军区’主办的第一期‘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学习班’在上海县北桥公社黄二大队一座孤房子里开班，历时35天，有‘学员’46人。第二期班从7月初开始，历时45天，有‘学员’92人。这两期‘学习班’共集中‘叛徒、特务、走资派’子女138名，全部是从14岁到20岁的初、高中学生。他们的117位父母全部是被关押、隔离、靠边审查的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黄克等人对这些青少年学生用尽了威胁、恐吓、欺骗等手段：不许回家，不许与家里通信，搞‘一帮一’监督；大会套小会，个个要表态，搞人人过关；揭发父母亲的‘问题’，搞‘家庭斗争会’；要大义灭亲，与‘反动父母’划清界限……在两期‘学习班’中，他们先后11次组织‘学员’们参加对他们父母的批斗大会，逼迫42名‘学员’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揭发父母的所谓罪行。这种卑劣的‘学习班’，使一部分青少年受到了蛊惑和蒙骗，造成了家庭分裂。这些‘学员’中，先后有3人患了精神分裂症，其中1人自杀身亡，1人离家出走后下落不明。”

这种大规模的干部子弟被逼加入“大义灭亲”式告密队伍的情形，在“文革”之前未曾出现过。《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就现有资料看来，大概也属于干部子弟“大义灭亲”

式告密——与儿子一起告发母亲的父亲，1940年参加新四军，屡立战功，文革前担任本县卫生局党总支书记，文革爆发后被打成本县卫生系统的头号“走资派”，儿子曾写过大字报揭发父亲；在母亲说出支持刘少奇的言论后，父子二人先后前往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告密。

#### ◇ 政治高压下，许多“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

不可否认，建国后前30年发生的海量“大义灭亲”式告密当中，确有不少案例，是告密者真的相信阶级感情必须高于血缘感情，是很真诚地在告密。一如当时的宣传语境所言：“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肃反等运动中，儿子检举父母、妻子检举丈夫，这正是人民群众觉悟提高的表现，是十分可贵的”。但并不是所有人的“觉悟”，都能像方志敏（杀死亲五叔）那么“高”，多数“大义灭亲”，其实是“大利灭亲”。《红卫兵忏悔“弑母”》这则新闻中，告发母亲的儿子面对媒体，即公开承认：“从表面上看，我所追求的并非私利，志向纯粹高远，而实质上自保的成分占了非常重的比重。甚至我也把它算作自己的一种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可能给自己带来不一样的境遇”——如果注意到其父当日已被打成“走资派”，母亲被怀疑是“国民党特务”，外祖父则在土改、镇反中被枪决，自不难理解其迫切想要“自保”的心态会有多么强烈；其父在告发妻子时的心态，大略也与儿子相似，作为一名现行“走资派”，其心态或许还会更为迫切。

李锐之女李南央在回忆母亲对父亲和自己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时，也认为母亲告密的主要动机，是为了现实利益，“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李南央说：“母亲的‘革命’变得越来越‘真诚’，越来越‘彻底’。她不但把父亲的北大荒来信交给组织，还把夫妻间的枕边话全部抖搂出来，用这种大义灭亲的方式，证明自己受改造的程度，以期重新得到党的信任。……当我知道母亲原来对‘大跃进’持有与父亲相同的看法；当母亲一封封寄来对我的批判信，甚至向我的单位领导揭发我的‘反革命言行’；探亲时领着我们早请示晚汇报；因为我男朋友的家庭出身有问题，让我断绝关系，在那以后，我心中残存的一点亲情彻底毁灭了。……她真的相信共同生活了20年，共同有了3个孩子的丈夫是反党分子吗？一定不是的，否则她怎么会在20年后父亲复出时动复婚的念头？但是她被毛泽东所显示出的绝对的威望、绝对的统治力震慑住了。她看清了，如果以前自己只是使用‘阶级’作为让李锐俯首帖耳的武器，此时她必须将自己与李锐划分在两个不同的阵营，才能够生存。她被眼前的一切吓坏了，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和别人合住一个单元（母亲在延安的信中，记述了不能容忍和自己的好朋友夏英哲共一窑洞）；她不能想象自己永远做一个炉前工（母亲在东北糖厂的信中，记述了受不了顶班的生活）；她不能想象自己经过廿年努力而得到的，三八式干部的优越生活条件和特权，从此不复存在（母亲信中屡屡流露出瞧不起工农干部和‘旧’知识分子的态度，她在东北的信中记述了自己是如何虐待保姆）；她的骄娇品格，决定了她根本无法面对这样的可能。她明白要恢复从前的生活，要保住物质的和精神的地位，今后只有紧跟毛泽东，除此别无选择。”

再如：《青春之歌》的作者、女作家杨沫和他的丈夫马建民，在当年的政治高压下，也陷入了“大义灭亲”式告密，互相揭发，并且招招险狠，直取对方政治生命。对此，杨沫之子的理解是：“在那种高压之下，人首先要生存，为生存而奋斗。别的如夫妻之间的感情、伦理、道德、亲情等等全顾不上了。我父亲揭发母亲1936年没有入党这个事情其实不是啥重要问题，只是一个入党手续不完备的问题。在巨大的压力下，他为了表现自己听党的话，忠于革命路线，才把母亲的这个事情交代出来了。”“母亲也开始毫不留情地揭发父亲。父亲与武光的关系，父亲与邓拓的关系，这都是母亲可以回击的武器。”

#### ◇ 结语

中国当代的“大义灭亲”式告密悲剧中，有整整两代人不可避免的迷惘、恐惧与巨痛，但它并不是“文革”的特有之物。对它的反思，须跳出“文革”，放置到更大的时代背景之下。这

反思中，个体的忏悔固不可少，政策层面的教训也同样亟需总结。

□ 原载《腾讯历史频道》2013-8-8

~~~~~

【亡灵祭坛】

一层终于捅破了的窗户纸

——纪念红八月受难者卞仲耘老师和证人林莽（陈洪涛）老师

• 王容芬 •

47年前的今天，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红卫兵活活打死。这起光天化日之下的谋杀案，至今未立案，凶手依旧逍遥法外。文革结束后，苦主王晶先生一直通过司法和政治途径为亡妻申诉，他采取了迂回的作法，告一个叫袁淑娥的教唆犯，而不是直接告凶手。案发所在地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案件逾期为名，不予起诉。杀人罪逾期，突显中国法律特色。

美国凶杀案专家佛罗里达州检察官本杰明·哈里斯就此案这样评论中美两国刑法：“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美国刑法专注于个体：个体保护和个体责任。其最重要的目标是，首先，不让任何无辜的人受到犯罪指控；其次，除非证据确凿不能判刑；再次，个体罪犯得到确认并受到惩罚。中国政府从未逮捕过任何一个杀害卞仲耘的罪犯，就我所知，这个案子也从未经过调查。”

2008年11月，哈里斯先生利用假期，自费来到北京调查这件凶杀案。所有被采访人不约而同问他：“您为什么要管这事？”他的回答也是他来华调查的基础：“卞仲耘遇害事件对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然而，假使不是那么多红卫兵——包括宋彬彬和刘亭亭——已经移民美国，从而将这件凶杀案从纯粹的中国内部事务变为美国人，至少我这个美国人的份内该管之事，我是不会参与的。因为我是受美式训练的法律工作者，一生的事业就是起诉凶杀案，这件凶杀案也具有专业的意义。”

在哈里斯看来，这件凶杀案其实很容易审理：“凶杀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持续几个小时之久，为证人指认凶手提供了理想的条件。此外，目击者有几十个，他们都认识凶手。因此，并不存在妨碍逮捕的证据不足问题。毋宁说，没有逮捕是因为中国政府裁定该凶杀案发生在群众运动条件下，所以没有应对其负责的个体，而只应由社会负责。”哈里斯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王晶先生，第一个问题是：“您认为谁应该为杀害您的妻子负责？”王先生不假思索答道：“毛泽东！”令哈里斯不解的是，“王先生从来没有要求我为他寻求公正，他从来没有告诉我他要我说的那种公正——确认杀害卞仲耘的凶手，将她们从人群中区别开来。”后来他们又见过两次面，哈里斯来华的计划没有进展，王先生留给他印象最深的话是：“在中国，人情大于人命。”哈里斯终于认识到，对于凶手的认识，中美两国除了法制上的区别，还有民间哲学上的差别。

难道是这种人情大于人命的哲学，让几十个人严严实实守着一个秘密，使卞仲耘案47年不能突破？

有两个敢于作证的目击者，女附中退休教师林莽（陈洪涛）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师在案发当天用左手给王晶先生写了一封匿名信，证明卞校长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难40周年之际，林莽先生挺身而出，在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中为这场惨无人道的凶杀案作证，并撰写《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详述卞氏遇难过程，虽然没有指出具体人名，

但描绘了一个个红卫兵的行为，比如，“有一个女将个子又高又大，腿又长，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着军靴的大脚。” 还有哪个红卫兵命令卞仲耘干什么，命令他干什么，哪个红卫兵对卞仲耘施加了哪种暴行，等等。（载本刊 z k 0 7 0 1 c ——编注）

上个月，50年代师大女附中的一位老校友来访，这位老师也是林莽先生的挚友，告知林莽先生离世前用左手写下证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脚踩死卞仲耘校长的是刘亭亭。由此方知先生已于去年9月21日去世，自责闭塞，上网补课，想看看各界对这位铮铮之士的评价。结果一无所获，连女附中（如今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网站都没发个讣告。林莽先生50年代就在女附中供职，人情竟是如此淡薄！其实不难理解，先生几次为卞仲耘之死作证，不仅是当年女附中红卫兵们的眼中钉，也是借90周年校庆表一颗忠心，非要树毛女、毛媳和给毛献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为荣誉校友的袁爱俊校长的肉中刺，如今袁校长成名誉校长了，忠心不改，余威犹在，绝不能让林莽的名字出现在任何她管得到的地方。

林莽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前，捅破了那层46年的窗户纸：那个又高又大穿军靴的红卫兵是刘亭亭，是她最后一脚要了卞校长的命。

人情大于人命，原来是天大的人情。刑不上大夫，面对凶杀案，这就是中国的法制和中国的民间哲学。发动文革的毛泽东是千古罪人，具体参与迫害致人死者，因为出身权门，所以不负刑事责任。一个国家受这样的法制和哲学束缚，永远清算不了文革反人类罪行。文革过来人都知道，1966年六、七月留守北京，一面发动揭批彭、罗、陆、杨，一面向中学和大学派工作组，往死里整人的正是刘少奇。林莽先生的文章里也提到，工作组进校第二天就叫他去听训示：“老老实实接受劳动改造！……打扫大操场及全校男女厕所……”一个在职教师，平白无故变成了劳改犯！刘少奇家人紧密配合，王光美亲自率工作组进驻清华，停课整学生。除了女附中的红卫兵刘亭亭，他们的女儿刘平平（现名王晴）是师大一附中红卫兵头头，儿子刘源是杀戮平民最狠的西纠红卫兵，只有六岁的刘潇潇没参与。刘少奇与前妻之女刘涛配合继母王光美，成立清华大学红卫兵和革委会，兼两个暴力组织的头目。文革之后，王光美率全家与毛家人握手言欢，其子刘源上将在文革复辟逆流里配合薄熙来，扮演了“军”师的角色，宣扬膜拜战争的文化史观。这种全武行的红卫兵不清算，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又要“千百万人头落地了”。

那么多目击者在近半个世纪里守着一个罪恶的秘密，不仅是束于人情，更因为凶嫌刘亭亭是国家公主。尤有甚者，某企业家为文革中被杀害的母亲塑像，竟请老红卫兵刘亭亭揭幕。比起这些“草民”来，林莽先生是大树，中国人缺少的正是林莽先生不畏权贵的高大人格。仅以此文纪念被红卫兵打死的卞仲耘老师和为红卫兵暴行作证的林莽老师。

（2013年8月5日）

参考文献

本杰明·哈里斯：中国沉默的长城：北京2008年11月
[http://difangwenge.org.simple/?t2461.html](http://difangwenge.org/simple/?t2461.html)

林莽：目击并身历其境者言——纪念卞仲耘校长殉难四十周年

www.edubridge.com/wenge/bianzhongyun3.htm

刘源：读张木生——《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序言

http://www.21bcr.com/a/shiye/renwusixiang/2010/0907/1561_3.html

□ 原载《纵览中国》2013-08-04

~~~~~

## 【劫后反思】

###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八）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0 8 a 〕

#### 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 9 6 7 . 6 — 1 9 6 8 . 9）

在清华团四两派一年多的争斗史中，影响最深远后果最严重的重大事件有两件。一件是 4 1 4 的分裂和革委会的流产，一件是百日大武斗。这两件既有联系也有因果的大事，留给我们太多的教训，也留下不少的疑团，至今仍然是我们这一代清华人饶有兴趣的话题。譬如，两派分裂的原因究竟是什么？4 1 4 到底有没有后台？两派主要头头又是些什么样的人？

在叙述我在 4 1 4 总部的活动之前，我先就这些话题谈谈我的看法。

##### 第一节 粗浅印象，团派的主要头头们

自“井冈山兵团”成立，我就是兵团总部的委员（后来进入核心组）。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我常与团派的主要头头们在一起议事，对他们有相当的了解。从 1 9 6 7 年 4 月份开始，我是“4 1 4 串联会”和 4 1 4 总部的重要负责人，核心成员，与 4 1 4 的主要头头们相处一年有余，对他们更为熟悉。在两派头头中，有较长时间对两派主要头头有过近距离观察和亲身接触的，我是唯一的一人。

尽管我有这样有利的条件，可惜我看人往往是不太准的。这里，我不可能对每个头头做全面的点评，我只谈我在与之交往的这段时间内的直观印象和粗浅感受。

为了忠实于历史，我把当年与这些头头共事的印象，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直书于笔下。显然，这并不表示我现在还有这样的印象。经历了几十年的岁月，我对当年的印象已经有了许多修正。我也明白，当年有的负面印象，并不是对方有错，其实是自己的看法太片面，有问题。

涉及到那么多的头头，留给我的好印象写出来，别人不会有太大意见。要是我现在再说一些不太中听的话，难免给人添堵，让人不开心。在这里，我先致歉了！我想强调的是，无论我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印象，我现在对这些朋友们从心里都是很尊重的。

先说说团派的头头们：

蒯大富（工化 9）是团派当之无愧的核心人物，更是灵魂人物。他威信的“原始积累”是在他与工作组不屈不挠的勇敢斗争中完成的，中央文革的肯定和信任则把他推上更高的一层楼。当蒯大富已经成为清华“井冈山”的代表人物，成为全国红卫兵的学生领袖，他在团派中的地位就变得无人可替代无法撼动般的稳固。蒯大富有很高的政治热情，政治嗅觉很敏锐，也很有权谋。他聪明能干，能言善辩，很有组织能力。外面的人以为他在总部会议上一定是搞一言堂很霸道的。其实并不尽然。一般地，他都是让大家先发表意见，由大家讨论，允许别人对他发表不同的意见，他也会参加争论。当然，一锤定音的结论是由他做的。总体而言，总部会议

还比较民主。就观点而言，老蒯在总部里并不算是最极端的。作为一把手，他要协调比他左的和比他右的各种观点立场，这确实是一件很吃力的事情。我在总部会议上从来没与他发生过正面冲突。可能是因为我比他大几岁，他对我的态度也比较尊重和友好。我与他的关系，如果说在“井冈山红卫兵”期间是“蜜月期”的话，从“井冈山兵团”成立以后，我们开始在观点上有比较大的差异，我对他的个人诚信也打起了问号，对他的一些处事行为的观念我也不太苟同。从工作组反蒯到蒯大富掌权这半年时间里，他有从地狱到天堂般的大落大起。他没有被工作组棒杀，却被喝彩的掌声捧杀得晕晕乎乎没过好掌权关。

鲍长康（工化9）是团派的二把手。他为人一贯低调，遇事冷静，思维缜密，讲究说理，形象上温文尔雅，不显强势。他有上海人特有的聪慧。在观点上他与蒯大富很接近。他对团派理论的阐释、团派观点的创新、团派利益的捍卫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讨论或争论中，他往往能从一个别人意想不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这点给我的印象很深。他是蒯大富得力的信得过的好副手。蒯大富不在校的时候，都是委托他全权负责的。因为他曾经邀请我参加“井冈山红卫兵”的筹备会，对于这样的“引荐人”，我对他多了一份别样的亲近。后来得知他在百日武斗中担任了团派的武斗总指挥，这令我十分意外。因为在我的印象中，他并不是崇尚武力解决问题的那种人。不过想想也是，在蒯大富不便亲任这一职务的时候，作为二把手，他无法推卸这个职责。

刘才堂（工化9）是蒯大富最亲密的战友之一。他与蒯大富、鲍长康等都是化9年级与工作组坚决斗争的那十几个经历生死考验的人。这些人，有的名正言顺地进了总部，有的隐身于幕后做着高参。以我的感觉，这个小圈子才是蒯大富真正依靠并影响决策的“影子内阁”，而总部核心组可能只是第二层的。刘才堂其实是一个思想比较单纯、性格很爽直、心计不多城府不深的人。这点上，我是很欣赏的，因为我害怕与心思过于绵密的人打交道。但是，似乎又感觉他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过于简单直接，常常是非左即右，非黑即白，非革命就是反革命，似乎不存在中间的过渡色带。因此，有时候对他观点的左和态度的极端让我很无语，有一种无法与他争论的感觉。不过，我始终认为，刘才堂是个心地透明的人，为人正直，在人品上我信得过他。也因此，即使在观点上我与他相距实在太远，我对他并不反感。

陈继芳（焊0），她的性格和观点与刘才堂十分相仿，也是嫉恶如仇，个性鲜明。我对她在工作组高压下的坚定不屈非常佩服。我那时想，如果是在战争年代，她肯定是又一个刘胡兰式的英雄。她是一个做事踏实的人。在总部里，她主管“二办”负责干部问题。不像我，在总部里是个甩袖掌柜，不管事情也没什么实权。只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观点太不一致，我在她的眼里是极右的“老机”，她在我的眼里是很激进的女将，所以彼此很少交流，也没兴趣交流。

马小庄（焊0）为人谦和，真诚朴实。那份农村小伙子的憨厚，第一眼就给人以值得信赖的印象。他很有涵养。与人讨论或争论，态度平和，平等待人，从不高声，也没见他发过脾气。到底是党员、学生干部，谈吐间显示出很高的政策水平，与我这样的群众就是不一样，让我不得不佩服。在团派中，他是与414打交道的最佳人选：既能维护团派的核心利益，又能提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我知道连“东方红战团”的头头对他都有良好的印象。就观点而论，他也是坚定的团派，但我愿意与他展开讨论。尽管意见难以统一，并没有影响我对他的好感。后来在“联合总部”，1967年的国庆节，“两派成立“国庆联合指挥队”，由孙怒涛、马小庄等人组成。”这是一次我与他的愉快合作。在众多团派总部委员中，我对他带有一份尊敬，尽管他比我小好几岁。

陈育延（力00）是一位极有个性、很有思想、很有主见、性格爽直、喜好外露的总部委员。在“八八”时期，我一直把她视为唐伟的副手，“八八串联会”的女中豪杰。这么一个低年级的小姑娘，能有这样非凡的见识和作为，真了不起，我很佩服。到“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

候，蒯大富对“八八”的两个主要负责人采用了拉陈（育延）压唐（伟）的分化政策。陈育延打响了反唐第一枪，又第一个提出对“八八”必须全盘否定，这让我对她的做法十分反感。那段时间，我与她公开冲突过，彼此闹得不可开交，心存芥蒂。所以此后我与她互不搭理。因为她始终以永远正确的左派形象示人，纵队派就给她封了一个“陈常左”的“雅号”，当然，这并非是个美誉。我离开总部以后，陈育延成了团派中的鸽派，一贯反对武斗，与鹰派常有冲突，这又是出乎我的意料。

王良生（水9）是我在总部里观点最相近的委员，一直是团派中的鸽派。因为有他，我才不至于有太孤立的糟糕感觉。“414串联会”成立一段时间以后，他旗帜鲜明地站在414这边，也成为414的负责人。作为414派出的学生代表之一，他参与了《四项协议》的谈判。414对他是信任和器重的。在414分裂的时候，我坚定地参加了414总部，他则留在“414串联会”里。等到“414串联会”并入到414总部的时候，414的负责人中，唯有他没有参加414总部。是蒯大富让鲍长康、马小庄出面做了他的工作，挽留他继续留在团总部里。就这样，我与他基本一致的观点，都曾是“天安门纵队”的一员，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营垒。沈如槐说起“这位可爱的王良生又只身离开了414、回到了井冈山”。我想，这中间的抉择各人有各人的考虑。人各有志，只能互相尊重各自的选择。我对王良生的选择虽然感到很遗憾，但是也能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在这个关口斟酌过，纠结过。“三七战团”中就有许多与王良生一样想法的人，既同意414的政治观点，又反对414的组织分裂。我与王良生的差别仅在于：我坚决地向前走了一步，他犹豫地向后缩了一步。多年以后，我与他从不同的地方又飘落到同一城市，相距不远，常有往来，我们依旧是相交甚欢的好朋友。

潘剑宏（机7）是总部办公室主任，我们都叫她“潘总管”。她既负责掌管清华的财物大权（譬如我在兵团总部期间凡去外地的人要借款都得经她批准），替蒯大富管好家，又保管着井冈山兵团与中央联系的电话号码。周恩来或中央文革要与清华“井冈山”联系就直接找她。而她也可以随时打电话到总理办公室或中央文革办公室。可见，她的地位十分关键、机密、重要。她尽心尽职、任劳任怨，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像批斗王光美的三十万人大会，具体的事务都是由她主持操办的。我要特别说一句的是，她以及团派中许多具体掌管钱物的经办人，都是清廉无私，经得起审查的。哪像现在的那些大小官吏，几乎无官不贪腐。由于她主管的是行政方面的具体事务，就政治影响力而言，她在总部里并不大。

最后，我想谈谈任传仲（自00）。把他放在最后，并不是说他最不重要，而是他最特殊。他在总部里的能量和影响都很大，所以不能不谈到他。而他又是一位我在总部里最有看法最不见容的同僚，这让我在如何谈论他时很有点顾虑。尤其是，他早已故去了。中国向来有为尊者讳为逝者讳的传统。对一位已经故去多年的熟人评头论足说三道四，那是很不厚道的。我思量再三，决定还是直言不讳。他如地下有知，敬请原谅我的大不恭。

任传仲是与我同系的低班同学。他不仅是我系也是全校很出名的蒯派。他在全校的出名主要是因为他在批斗蒯大富的全校大会上对蒯大富反戈一击的惊骇一幕。这让不少蒯派都在背地里骂他是“叛徒”。他这样的表现虽然不足称道，但多少还是可以谅解的。因为那个时候工作组对蒯派的政治高压是极其厉害的。几乎所有的蒯派都做检查交代认错认罪了。我认为，认错认罪是可以的，但是要公开站在工作组的立场，对蒯大富的“反党”罪行揭发鞭挞，这样的“立功”表现就有点过分了，一般人是做不出来的。事后，蒯大富不计前嫌，在“井冈山兵团”成立的时候仍然重用他，让他做了总部核心委员。我对蒯大富宽宏大量的气度和敢于用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的人的魄力感到惊奇和佩服。从中，我也看出蒯大富是一个政治人物，非我等常人可比。我是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但是，我对蒯大富重用“大节有亏”的人暗暗担心。我认为这样的人可使用，但不宜重用。而任传仲因为重新获得蒯大富的信任和重用，对蒯大富就表现得格外忠诚，甚至是死心塌地的忠心耿耿。这就是蒯大富很有政治手腕的驭人之道。



上面这点“变节”还不是我对他最有看法的主要原因。我最看不惯的是他从说话腔调到行为举止一身的痞气。4 1 4 骂蒯派是痞子，在总部里，能够对号入座的，就他一人。我非常反感他的痞气，所以我从来没主动与他说过话打过招呼。我始终都没弄清楚他的政治观点是偏左还是极左，他似乎只对抄家打斗争会场等“革命行动”感兴趣。他是武斗的主战派，七二七那天，“仅作战部部长一人就用长矛刺中7名工宣队员73的腰或腿或臂部”，这位“作战部部长”就是指他。到清查五一六的时候，被蒯大富视为心腹的得力干将任传仲再一次对蒯大富反戈一击。蒯大富后来说：“任传仲这个人真正是个叛徒，搞武斗最凶的。他上台说：蒯大富！你是五一六，你在搞阴谋！在清华发展庞大的五一六集团。……回想文革时身边的极左分子，往往就是投降派。”当蒯大富再次品尝到同一杯苦酒的时候，才算对他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

## 第二节 粗浅印象，4 1 4 的主要头头们

再说说4 1 4的头头们：

沈如槐（力0）的“千钧棒”比他先出名。总部开门整风中，“千钧棒”因坚决抵制蒯大富的错误、坚决批判极左思潮成为闻名全校的战斗组。由此，沈如槐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政治新星，在“东方红战团”的拥推下脱颖而出，成为4 1 4的一把手。因为资历较浅，他在4 1 4总部里的权威性没有像蒯大富在团派里那么强。这点上，沈如槐是有自知之明的，所以他格外地兢兢业业、以身作则、尊重大家，作风也更为民主。作为4 1 4的一把手，他捍卫4 1 4群体的利益。他又是“东方红战团”的核心，典型的“东方红战团”观点，所以他更坚定地捍卫“东方红战团”的利益。在4 1 4总部里，“东方红战团”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他深知，要是没有“三七战团”的帮衬，一旦“三七战团”与“东方红战团”发生内讧，4 1 4将不攻自破，陷入危机。所以他对我的尊重胜于我在团派里的礼遇。沈如槐为人正直，敢于担当，坚韧不拔，既有主见，也有魄力，原则性很强。他很能思考，常常提出新颖的观点，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观点也常引发争议。他人很聪明，演讲的口才虽不及老蒯那样出口成章滔滔不绝，但是笔杆子相当厉害，文思敏捷，条理清楚。虽是低班学生，毕竟是学生党员，做过团支书，有过历练，领导4 1 4总部这一班人有章有法。在4 1 4中，有资格和才能做一把手的，起码还有三四位，但是既然沈如槐成了一把手，大家就都尊重他，拥戴他，谁也没有想去挑战他、取代他，所以4 1 4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争夺领导权的内斗。作为一把手，总部讨论时最后的拍板定夺都是由他做出的。与蒯大富在团派里的地位不同，4 1 4总部里没有离了谁就一定不行、离了谁就群龙无首的灵魂人物。沈如槐不是，其他如外界一些人猜测的陈楚三、周泉缨等更不是灵魂人物。但是4 1 4里有核心人物、决策人物，那就是沈如槐。他也不负众望，殚精竭虑，一直尽职尽责地领导着4 1 4。有人以为沈如槐只是形式上的一把手，是傀儡，是替身，那就大错特错了。很可能是沈如槐自己说过他作为4 1 4这个团派“反对派的一把手，没有丝毫的权力”这句话给人以误解。仅就沈如槐倔强的性格而言，他也不是甘为傀儡的那种人。我对沈如槐最不喜欢的地方是他对《必胜》的态度，这在下面再详尽叙述。

汲鹏（压00）是我交往最密的朋友，并肩战斗的战友。“第一湘江”与“轮机兵”宛如两兄弟。“天安门纵队”和“三七战团”，我们都是发起人和代表人物。我们从新水相遇为邻一直互相支持亲如一体，首先是因为我们俩在各种问题上的观点一致或接近，其次还在于我们在为人处事上都不喜欢走极端。他看问题有前瞻性，相当深刻，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性格豪爽、为人仗义，这些都是我这个南方男人所欠缺的，因而也为我特别欣赏和佩服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名句“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就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可见我的知识是多么的贫乏）。他本人就是一个坦荡荡的君子。汲鹏演说家的天分不仅令我，也为两派的头头和群众所折服，所倾倒。有位好友曾评说，如果把汲鹏那些获得满堂喝彩的演说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其实从字面上看也不过是一些平常稀松的词语。然而，他永远不打草稿上台即兴发挥的演说，居然具有

那么大的煽动性和蛊惑力，排除派性的因素，全在于演说本身的魅力。也不能说汲鹏的演说内容全是常人常言。好多闪光思想，不少至理名言，都是在即兴讲演中脱口而出的。“历史，就是历史！不是任人雕刻的大理石！”已经成为脍炙人口的名句，几十年来，一直为我们这些清华人所津津乐道。

宿长忠（水7）是一位出色的组织家，具有极强的组织才能。我这种人，是属于书生空议论的，不懂得怎样去组织群众、动员群众。正因为我的组织能力很弱，所以对宿长忠在这方面的天赋就格外钦佩。414能从一个很松散的串联会到一个拥有七千人的从总部到分部体系完整组织严密的群众团体，宿长忠劳苦功高，贡献至伟。在“八八纵队”里，宿长忠是头头。沈如槐是他的副手，声名在他之下。但是在“东方红战团”推举沈如槐成为414一把手以后，宿长忠甘居沈如槐之下，毫无个人杂念，依旧辛劳勤勉，那种不计职位高下的无私精神令我肃然起敬！在414的所有行动中，宿长忠不仅决断果敢，而且总是身先士卒，身体力行，全力护卫其他的同志。所以，宿长忠在414的上上下下，享有极高的声誉。毕业后他遭遇了太多的不公，英年早逝，令我万分悲痛！

陈楚三（力6）思想敏锐，风度儒雅，举止稳重，才华出众，人品上佳，是“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人物。他写的文章，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有理论水平，富有征服力。他也是最能提出新颖观点的414头头，这些观点大部分都能为414的多数群众所接受，成为四一四思潮的组成部分。陈楚三是一位既让我敬重又让我不敢过密交往的朋友，原因就在于他的身份。他是陈潭秋烈士的儿子。陈潭秋是中共一大代表，与毛泽民同时牺牲在新疆军阀盛世才的屠刀之下。他不可能再像瞿秋白那样会从烈士变成“叛徒”。对于这样的革命先烈，我打心眼里敬重敬仰！因此，我对陈楚三也格外多了几分敬意。但是，我又风闻他是康生的养子。其时康生身居中央文革顾问要职，正红得发紫。而我对陈楚三的这一个背景，却极为忌憚。我不希望414因为陈楚三而与康生有撇不清的关系。414不企望因为康生的背景而红得发紫，更不想因为康生的万一倒台而被殃及池鱼。我宁愿与蒯大富、沈如槐这样平民出身的人交往，而对陈楚三这样有高干背景的人物，我反而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我之所以会这样，很可能是因我的眼界比较窄、胆子比较小、顾虑比较多、对高干子弟的成见比较深的缘故。后来，随着交往的日渐增多，我对他本人了解也深了一点。经过“414战歌事件”，他被北京市公安局抓去又放回来之后，我对他不再存有戒心，平添了几分对他坚贞不屈的敬佩。

刘万章（工物6）是个勤勉踏实的人，组织能力也相当强，是414里的实干家。他的组织能力在大型活动的组织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414举行的集会、辩论会、进城游行等大型活动，他往往都担任总指挥的角色。许多具体的事务工作都要靠他去落实，他都尽心尽力去做好它、完成它。刘万章也是“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之一。就观点而论，相比较其他的“东方红战团”核心，我的感觉要稍微温和一些。他脾气很好，很有涵养。有一次大会上，他因口误把“小小寰球”说成“小小铜环”，我们调侃他，他也不生气，笑笑了之。

张雪梅（水0）是414总部里唯一的女学生委员，因此格外抢眼。她个性爽直外向，有话就说，不模棱两可。做事干练，不拖泥带水。在对《四项协议》及陈楚三被抓这些大事上，她观点鲜明、态度坚决，有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她也是“东方红战团”中的核心人物。

蒋南峰（无6）是个极具另类个性的人。他既没有组织一个战斗组，更没有拉什么纵队、战团，完全是单兵作战。他写的大字报，往往只有一二张纸，短小精干，简明扼要，观点表明就止，不像我写起来洋洋洒洒罗里罗嗦的好几张。他从来都是以蒋南峰署名，不用笔名化名。最开始我还以为他是蒋南翔的弟弟呢。他既不属于“东方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是414总部学生委员中唯一的“无党派人士”。他独往独来，天马行空，个性倔强，很有自己的

独到见解，跟谁都敢顶嘴、反驳，不太顾及别人的脸面。他的动手能力是超一流的强。

高季章（水9）是总部的一般委员。我之所以要介绍他，不否认我与他私交甚好这一因素，更因为他是《井冈山414报》的负责人。这是一个由“三七战团”掌控并基本代表“三七战团”观点的414部门。《414报》的观点一向比较温和，与团派《井冈山报》比较极端的风格截然不同，与414广播台的风格也有较大差别。在经费紧张物资匮乏条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能把《414报》坚持办下去实属不易。我与汲鹏虽是“三七战团”的代表人物，但很少过问实事，高季章才是“三七战团”的实际主管。他在“三七战团”的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他多次组织了以“三七战团”名义出面的重磅大字报以及与“东方红战团”联合署名的声明和发言稿。他勤于思考，思维严密，观点平和，态度诚恳，对理论问题尤感兴趣。如果说四一四思潮是广大414群众的集体创造，“东方红战团”与“三七战团”对四一四思潮的形成、发展、完善都有极大的贡献，那么在“三七战团”中高季章无疑是最大的贡献者之一。

周泉纁（动6）也是一位不能算414核心头头但是非得详细介绍的总部委员。他思想敏锐，观点独特，很会分析问题，很能逻辑思维，而且引经据典有一定理论深度。在“414串联会”成立前后，我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也比较正面。每有聚会，他都很喜欢发表演讲，一套一套的，常常是语不惊人死不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感觉，他那些标新立异的见解，给人以新鲜的刺激，让人耳目一新，甚至振聋发聩，听着过瘾，很有启发。但是有些观点说着说着就会过了头，因此觉得有点偏激。为此，我与汲鹏等“三七战团”好友常在一起议论周泉纁的观点。后来，每当听到他有些观点豁了边，过了头，我们就在底下相视一笑，偷偷地小声说，周泉纁又“尖端放电”了。“尖端放电”本是电学现象。我们说他“放电”，那是夸他的观点新颖、独特、很有启发性，我们被电到了。说他“尖端”，就是过头了，偏激了。正确的思想往前多走一步就成了谬误。那时我们说他“尖端放电”，是善意的调侃，并非讽刺，更无恶意。那段时间，我和“三七战团”的朋友对他的评价是肯定的，而且是比较高的，关系也是比较融洽的。周泉纁虽然只是总部委员，从未进入414的核心层，但因为他是“东方红战团”的核心成员，在总部里又比较活跃，所以很有影响力。关于周泉纁，我没想到这之后不到半年，我与他的关系会急剧恶化，我对他的印象会那么糟糕。这起因，全是因为他的《必胜》。

革命干部的代表，团派里是韩银山、张修身，414里有龙连坤、李振民。这些工农出身的清华中层干部本身的素质都是很好的。414总部里还有谭浩强这样的清华牌干部。这些干部在各自的总部里，即使参加最核心的会议，其作用也不过是参谋或顾问。那时，“革命小将”掌实权。在决策层，不仅“小将”在数量上占绝大多数，说话的分量也远超“革命干部”。尽管414高举的是解放干部的大旗，在解放干部上做了许多工作，但是，在干部的使用上，虽然比团派要好得多，除了干部办公室等少数机构干部确有实权外，其他也只是一般参与和使用。像龙连坤、谭浩强这样的中层干部，在414总部里，不能说是陪衬，但也只能算是配角。

沈如槐是414的一把手。那么谁是414的二把手呢？414从来就没有正式明确过谁是二把手。要是我说我是414的二把手，我想不管是414的头头和群众还是团派方面，都不会对此有异议的。至于414的“老三”是谁，既没有明确过，也没有公众一致的认可。宿长忠、陈楚三、汲鹏这几位都有可能，难分伯仲。团派惯用的“沈孙汲之流”代表着他们的看法。

上面我简单地谈了对团派和414主要头头的印象。我在本书中提及到的这些人，据我所知，在这几十年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尽职地贡献，都有显赫的成就，远非我能比能及的。

在1967年年中的清华政治舞台上，出现了2个总部、5个代表人物这样的政治格局。假如投射成一条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兵团总部占据着光谱的左边，人多势众，能量最大，受

中央文革支持，是掌权派。4 1 4 占据着光谱的右边，势力稍逊于团派，还常被中央首长批评，是在野派。两个总部的核心人物是蒯大富和沈如槐，占据着各自总部的中心，亮度最高。比蒯大富更左一点的代表人物是刘才堂，比沈如槐更右一点的代表人物是周泉纓。集合在刘才堂、周泉纓周围的人数不多，但能量可观，往往影响着蒯大富、沈如槐的决策。在蒯大富与沈如槐之间，还有一个代表人物，那就是我。我代表的是人数超多、能量超弱、但体现了人心向背的大批中间群众。在兵团整风期间，以我为代表的“天安门纵队”与蒯大富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近。到“4 1 4 串联会”时期，与蒯大富越来越偏离，与沈如槐越来越靠近了。到4 1 4 总部成立，我代表的“三七战团”完全脱离了蒯大富，而与沈如槐的“东方红战团”结成了紧密的同盟，但是还保持有一定的距离。我在这条政治光谱上，是由左往右慢慢移动的。

很遗憾，在这条政治光谱上，左，并不代表正确；右，也不代表正确。左与右之间的中间点，同样不代表正确。在左倾路线指导下的文革，团派的“极左”与4 1 4 的“极右”其实都是左的，离正确的那点都很远。差别仅在于，团派比4 1 4 更左而已。

### 第三节 坚持“三不”原则：不寻靠山、不找外援、不炮打中央首长

在做头头期间，我一直很明确地坚持“三不”原则：不寻靠山，不找外援，不炮打中央首长。这一原则，是我与汲鹏及“三七战团”的核心人员共同商量定下来的，也与“东方红战团”的主要头头交换过意见，为他们所赞同。

#### 一、不寻靠山

当时的政治形势瞬息万变。今天红得发紫的大人物，说不定明天被江青或康生一点名，就倒台了。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陶铸。

文革前，陶铸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长。因刘少奇、邓小平的倒台，在1966年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有中央文革顾问等显赫头衔，地位如火箭般的直升至党内第四号交椅。转眼之间，在1967年1月份，又沦为党内最大的“保皇派”，迅即被打倒。

要是找了这样的靠山，他炙手可热的时候可能也跟着春风得意，一旦他倒台了，也跟着一起玩儿完。把一个群众组织的命运捆绑在一位中央首长身上，听命于他的指示，随着他的沉浮而沉浮，那就失去了自我，就是政治投机。这不是我所热衷的革命。

我所欣赏的是这样的：始终坚持用毛泽东思想辨别是非，识别真伪，指导我们的一切言行。如果做对了，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我们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结果。我们有成就感，也有自豪感。要是做错了，那是我们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深刻领会、坚决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的后果。我们不怪任何人，输也输得心服口服。

这，就是我们不找靠山的理由。

#### 二、不找外援

在1967年的上半年，社会上已经普遍出现了两派对立甚至分裂的现象。

我不太了解外校和社会上的两派，也没认真研究两派产生的根源和规律。清华的团四两派，因为观点比较鲜明，力量相差不是十分悬殊，再加上清华的特殊地位，所以两派的影响都比较大。于是，那些被掌权派压制得喘不过气来的少数派在野派，往往会找上门来，寻求我们的支持。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北京师范学院 75 的少数派，他们拉着队伍到清华来，既是声援 414，也是希望寻得 414 的支持。他们呼的口号是誓与 414 “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我们既感动于他们的热诚，但是也不敢与他们有过深的交往。因为，说实在的，我们并不了解他们。

我们无法对他们提供实际的帮助和指导，我们也不想万一有一天他们出事了而累及我们。我们并不想拉外面的势力来壮自己的声威，那是一时的、虚假的、靠不住的。我们只想在清华园里踏踏实实地把本校的文革搞好，吸引更多的师生同情、支持、参加 414，这已经够让我们费心费力的了。

北京后来出现了天派、地派。聂元梓、蒯大富、韩爱晶属于天派，谭厚兰、王大宾属于地派。

在我们看来，他们都是中央文革的宠儿，都是全国闻名的响当当的造反派，都是掌权派。我们搞不清天派地派的分歧究竟在哪里。所以，在私底下议论时，我们常用“狗咬狗”这样的不恭用词来形容。据说天地派的后台是不同的。即使后台不同，这些后台也都是位高权重的中央首长，我们攀不上，我们也不想攀。从我们内心讲，我们不想介入天地派的纷争。

仅仅因为 414 是蒯大富的对立派，所以社会上的人们就把我们划为地派。我们完全是“被地派”的。平心而论，414 并不热心地派，地派对 414 也有不少看法。

相比较北大和北航，地质对我们态度要友善一些，我们当然不会拒绝他们的好意，我们对他们也是友善的。韩爱晶是蒯大富的铁杆盟友，我们并没有因为这一点而故意与“北航红旗”交恶。相反，因为听闻北航搞得很不错，我们对韩爱晶还带有一份好感。当然，外面任何让蒯大富碰一鼻子灰的事情，我们是偷着乐的。至于他们的活动，不管是天派组织的还是地派组织的，能不参加的不参加，乐得做一个旁观者。

然而，想虽然是这样想，碰到具体的事情，往往就不见得一定坚守这条原则了。因为天地派的格局已经形成，我们参加过一些地派组织的活动。譬如“揪刘火线”，“火烧英国代办处”，这些都是地派组织的活动，我们都参与了，都犯了错误。当然，我们并不是因为是地派组织的活动才去参加的，而是因为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正确的才去参加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是受派利益的驱动所致。

看来，414 也只能在清华园这一亩三分地上闹腾闹腾，一参与社会上的活动，也立即犯错误，与蒯大富毫无二致，最多是有点程度上的差别。

### 三、不炮打中央首长

所谓炮打，最常见的形式是公开贴中央首长的大字报，隐秘一点的是暗地里整材料为公开炮打做准备。炮打的程度轻一点的，是质问的口气，或者把问题往刘少奇上联系。厉害一点的，就不客气地用“打倒”、“揪出”之类的字眼了。

那个时候中央文革的人，特别是江青、康生等，他们要么明着指示要么底下透风某某在历史上有问题，某某是反对毛主席的。于是，某某就成了被炮打的对象，被革命群众揪出来示众了。如果某个造反组织率先炮打了，而且炮打对了，那么这个造反组织就立了一大功，捞了一票政治资本，在镇压或对抗另一派的时候，也就增加了厚厚的筹码。所以，许多造反派抱着投机的心理，对炮打乐此不疲。

我们既没有高人指点，也没有过硬后台，全凭着自己的判断行事。

对于中央首长，我们既不了解他的历史功过，也不清楚他的现今是非。那些被无产阶级司令部点名了的，肯定是“犯事”了，我们就跟着欢呼一阵。至于他们为什么被炮轰被打倒，除了知道一点罪名，详细的依旧不清楚，稀里糊涂的。

仅凭小报上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是很难判别他是不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如果我们随便炮打，万一要是炮打错了，那就犯下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大罪，414也会因此而被牵连，实在犯不着。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能力有限，态度很保守。宁可不犯错误，也不想争这个头功。

我认为绝大多数的炮打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赌博。炮打对了，那是因为正好符合中央文革的政治需要，于是就大紫大红，立了新功，赚了一票。要是炮打错了，也就是炮打了中央文革不希望打倒的人，那轻则是被批打了横炮，干扰了毛主席的战略部署，重则就是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立马被抓起来，送进无产阶级专政的铁笼子里。有哪一个大人物是因为群众的炮打、揭发而下台的？没有！那些被打倒的人，都是上面有人成心要打倒他们，炮打是那些要打倒他们的人利用造反派造的舆论和声势。

我们实际接触过的中央首长中，有好几位我们心里是有很意见的。即便如此，我们也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发牢骚表示不满而已，并没有炮打的打算和实际行动。唯一的一次是，1968年春天，我们对谢富治的积怨实在太深了，社会上正好有一股倒谢风潮。414也蠢蠢欲动，准备猛烈地炮轰一顿，巴不得把谢富治打倒，出出这口恶气。最后，中央出面保了谢富治，我们赶快做了缩头乌龟。

另外414里曾经发生过反康生、炮打陈伯达的事情，这都是414里个别战斗组的行为，并非414总部在底下鼓动。身为414总部委员的周泉缨曾经炮打陈伯达，这一做法连沈如槐也不支持，414总部更是反对。像陈伯达、江青、戚本禹等人我们心里是有看法、有不满的，但是414总部并没有公开反过他们，炮打他们。

“三不”思想也可以说是四一四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上靠毛泽东思想，下靠414广大革命群众，努力走一条特立独行的路，这就是414核心层的基本共识。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3年2月第一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             |          |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